

人类学文库
主编：徐杰舜 周大鸣

族群岛： 浪平高山汉探秘

吴和培 罗志发 黄家信 著

RENLEIXUE WENKU

ZUQUNDAO: LANGPING GAOSHANHAN TANMI

广西民族出版社

族群岛： 浪平高山汉探秘

吴和培 罗志发 黄家信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族群岛：浪平高山汉探秘

吴和培 罗志发 黄家信 著

- 责任编辑 黄自修
封面设计 李筱茜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30千字 插页4幅
版 次 1999年6月第1版
印 次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363-3687-X/C·95 定价：23.00元



浪平乡府所在地——浪平圩 公路左边依次是广东寨废墟、中学教学楼、宝瓶树等。



浪平圩日 每5天成圩，赶圩的约有两千人，从中可见众多头上戴帽子或头帕巾的高山汉。



魔公用的木雕脸谱：伏羲、杨八郎、判官、杨公、算匠、笑和尚、土地、开山、琴童。



观音桥 在浪平每一处能够架桥的地方，都会有很多杉木或杂木堆于其上，这样做是为了求子、求寿、禳关等。在架桥时，还要树起两根竹，祈求小孩子像竹子一样快长快大。竹子上放有鸡蛋、三角粽、各色布条，希望能“引个男娃娃”来。

土地庙

(1999年3月12日摄于马蹄岩屯)。





高山汉威力无比的火铺 他们认为火铺上火旺能帮他们驱邪、暖身。图中这户人家正在准备午饭，菜板放在火铺上，有一些人正坐在火铺上烤火（1999年3月12日摄于什良）。



高山汉的新郎和新娘 新娘肯定要戴头帕巾（1999年3月12日摄于什良）。



高山汉最常请用的八仙 八仙常用的乐器有唢呐、长号、二胡、月琴等。



勤劳的高山汉妇女 满口围腰和头帕是浪平妇女最主要的服饰特征（1999年3月12日摄于什良）。



新“三间两厦两厢”住房 浪平高山汉近年来住房条件有了改善，但新起的房子仍保持着浓厚的传统(1999年3月12日摄于九洞坪)。



高山汉的腊肉 腊肉是浪平人的主要肉制品。这是九洞坪李延斌家的腊肉，他家有8口人，1999年春节杀了3头大年猪，大约做了500斤的腊肉，可吃到对年又杀年猪时为止。



“独家村” 全屯仅有一户的高山汉传统的房屋，掩映在核桃、油桐、柿子等树中(1999年摄于龙湾屯秦家)。

指路牌 在浪平随处可见，碑上往往有立碑人的附加说明。此碑是因儿子不乖，其父为他做功德立的。



人类学文库 / 总序

人类学作为一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心理的独立学科，自 19 世纪中期形成以来，在国际上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关心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决策性学科，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显学。

20 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并曾在 30 年代至 40 年代得到过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李源、吴泽霖、林惠祥、杨成志、凌纯声、费孝通、林耀华、岑家梧等这些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声誉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著的《江村经济》还成了人类学本土化的开山之作，从而开创了国际人类学发展的新时期。

毋庸讳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50 年代以后，人类学作为一门所谓“资产阶级学科”而被取缔，致使其元气大伤，直至 70 年代末乾坤扭转以后，社会学、民族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人类学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恢复较缓，发展较慢。中国人类学会虽然于 1981 年 5 月宣告成立，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在此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仍处于缓慢发展的态势之中，与突飞猛进的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不可同日而语。

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一批出国留学的人类学博士、博士后们的纷纷归来，为缓慢发展中的中国人类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从而激发了中国人类学的活跃。1995年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了乔健教授的《中国人类学的困境与前景》一文，一时间人们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问题议论纷纷，形成了1995年中国学术热点之一。由此开始的学术讨论，后来都集中到了“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上。

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文献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是中国人类学界的一项重大使命；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解读和分析，是中国人类学界的一项更重大的使命。因此，“人类学文库”的宗旨是：在人类学本土化中提倡和引导人类学田野考察，从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心理关系丰富的中国社会生活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指导现实生活的规律性的东西，使中国人类学在走向人民、走向社会中得到洗礼、得到发展。

了解人类学史的人们都知道，人类学学科是靠田野调查起家的，国际人类学界大师们有价值的著作、有影响的理论基本上都是对田野调查的提炼、概括和升华。

——古典进化论学派最著名的大师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1~1917）曾深入墨西哥的偏僻山乡游历，对那里的民风民情以及考古出土的文物作了深入的田野调查，于1861年出版了《阿那瓦克：或古代及现代的墨西哥与墨西哥人》。^①这部墨西哥之旅的游记，作为泰勒关于人类学的处女作，奠定了他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此后他于1865年推出的《人类

^① Tylor, E. B. *Anahuac; or Mexico and the Mexicans,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Longman, Green and Roberts. 1861).

早期历史及其文明发展之研究》^① 以及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都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进化论思想。尤其是他的煌煌巨著《原始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从田野调查中得来的民族志资料。而他在书中所用的资料，所进行的描述和分析，都有目的地导向“人类的文化基本上都受到进化发展的特定规律的支配”^② 这一理论原则的建立。古典进化论的另一位大师摩尔根 (Lews Henry Morgan 1818 ~ 1881) 也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他曾长期深入印第安人居留地，考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社会机构。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中，摩尔根同印第安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被易洛魁人塞纳卡部落鹰氏族收养入族。在这个深厚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摩尔根从 1851 年发表《易洛魁联盟》开始，继而于 1870 年出版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③ 提出了人类社会由初期的杂乱性交，经过群婚制的各种形式而达到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进化理论，以及由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而导致氏族制度最终走向灭亡的氏族进化理论。最后于 1877 年出版了最能代表他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力作——《古代社会》。《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评价这部书时说：“这是对文明的起源和进化所作的最早的重大科学论述。”^④ 从田野调查到古典进化论，泰勒成了“人类学之父”，而摩尔根则是“为数无几”

① Tylor, E. B., *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London: John Murray, 1865).

② 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5 页。

③ 另一说为 1871 年，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年 11 月，第 25 页。

④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五版，第六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中文版，第 14 页。

的“对20世纪有巨大影响的19世纪社会思想家”。^①

——曾风靡于欧洲的传播论学派作为反对古典进化论学说的一个学派，也没有离开过田野调查。如德国传播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弗罗贝纽斯（Leo-Frobenius 1873~1938）为了论证“西部非洲文化圈”的存在，曾经11次对非洲进行考察，于189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巨著：《非洲文化的起源》，明确地把刚果河流域、下几内亚和上几内亚河沿岸确定为“西非文化圈”，并论证了该文化圈的特征包括两面坡房顶的直角房屋、用植物作弦的弓、用植物作弦的多弦乐器、沙漏计时器式样的鼓、假面具等诸方面，从而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文化圈”的概念，认为整个“文化圈”都可以迁移和传播。又如英国传播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里弗斯（W·H·A·Rivers 1864~1912），1905年后曾对印度南部的托达人进行了第一手的研究工作，1906年出版了《托达人》；1908年完成了对美拉尼西亚诸岛的田野调查，1914年出版了《美拉尼西亚社会史》。此书对大洋洲移民史的研究，虽今学术界不敢苟同，但他在该书导言中对美拉尼西亚所作田野调查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来的“各族联系及其文化的融合，是发动各种导致人类进步的主要推动力”^②的观点则是正确的。

——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开山祖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1）从转向从事人类学研究开始，就在巴芬兰的爱斯基摩人当中作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其后出版了《中部的爱斯基摩人》。在此后人类学研究的生涯中，他大力提倡长

① 摩尔根，保罗·博安南序，李培荣译：《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1965年版，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② 转引自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第73页。

时间地在小范围内进行详细深入的田野调查，开创了文化人类学“透视性”（Perspective）的一代学风。正是在这种大力提倡田野调查的背景下，博厄斯虽曾一度接受进化论的观点，却没有归附到进化论派的大旗下；同时，他又认为传播论派的学说漏洞较多，也没有认同该派的学说。^①他在长期的田野调查以及科研和教学实践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独具一格的包括文化相对论、文化观的发展与“文化区”的概念的文化观，这使他获得“文化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之父”的美誉。

——英国功能学派的鼻祖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1）受名著《金枝》的启发，也转向专攻人类学，之后即身体力行进行田野调查。他于1914年9月抵达新几内亚，先后在麦鲁岛、多布岛以及特罗布里恩岛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的蔓延而于1918年10月才离开特罗布里恩岛抵达澳大利亚，并于1919年在墨尔本居留了一段时间，从事田野调查。直至1920年他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后，每逢假期，他总是到欧美诸国从事田野考察和讲学，或去非洲等地指导他的学生进行田野调查。正是在如此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的基础上，他在批判文化进化论和传播论等派学说的同时，不仅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以文化变迁的动态研究为主的功能学说，而且还总结了田野调查的经验，提出人类学家不应当只是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而应当是一个主动的参与观察者，从而创立了参与观察法，并成为当代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先驱。

——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女将之一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① Brue. L. O. etal; One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y. PP118~14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转引自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45页。

Fulton Benedict 1887~1948) 最早曾到皮玛 (Pima) 印第安人部落作田野调查, 发现这里与她早期所熟悉的普埃布洛 (Pueblo) 印第安人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此后, 她多次到阿帕契 (Apache)、科契蒂 (Cochiti) 以及布莱克福 (Blackfoot) 等印第安人部落中进行田野调查, 并于 1934 年出版了《文化模式》, 提出了轰动学术界的“文化模式论” (Patterns of Culture)。而她关于日本民族性的《菊花与剑》一书却是她运用“文化模式”理论研究的一个成功个案, 它使得研究原始民族为主要任务的人类学家的注意力导向了对现代社会的研究, 使人类学走出了原始社会, 转而走进了现代社会, 从而大大提高了人类学学科的地位。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另一女将米德 (Margaret Mead 1901~1978) 更是从田野调查中获得了辉煌。在她的前期学术生涯中, 1915 年她只身远赴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 在几乎与世隔绝的萨摩亚人中作了 9 个月的田野调查, 从而完成了博士论文《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生活》; 1918 年, 她又动身前往新几内亚北部阿米拉提群岛的马努斯人 (the Manus) 中作田野调查, 先后出版了《新几内亚儿童的成长》、《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等著作, 从田野调查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文化对人格与行为模式塑造的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在米德后期的学术生涯中, 她的研究从原始文化转向了当代社会文化, 对社会文化的急剧变迁、家庭解体、种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学生运动、性解放、代沟等一连串问题作了大量的田野调查, 发表了一系列著作, 从而使人类学家的影响大大超过了本学科的范围, 使人类学开始从人类学家的书斋里走向社会, 走向人民。

——新进化论学派的斯德华 (Julia N. Steward 1901~1971) 大师在 30 年代初获得博士学位后就曾携新婚的妻子在松松尼、普埃布洛印第安人中作田野调查。1935 年在国立史

密森博物馆所属的美国民族学局任职后，又曾深入到南太平洋沿岸的秘鲁和厄瓜多尔等国进行田野考察。1943年他作为美国民族学局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邀请近百名欧美诸国的专家学者对南美印第安人进行调查，完成了6卷本的《南美印第安人手册》。正是在这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斯德华于195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文化变迁的理论：多线进化的方法论》，从中提炼、概括和升华出了“文化生态学”以及新进化论的理论，从而为新进化论的重振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他的文化生态学还对当今与未来世界的环境和生态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

——结构主义学派的大师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G·Levi-Strauss 1908~）也是靠田野调查起家的。当他1934年转向人类学研究时，利用担任巴西圣保罗大学社会学教授的机会，多次深入巴西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1938年6月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又率人类学考察小组到巴西内陆的马托格罗索高原等地对印第安人进行田野调查。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加上受到新兴的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从而创立了结构人类学的学说体系，把长期以来僻居于欧洲理论文明边缘的人类学研究成功地引入了社会与文化思想界的核心圈子中。同时，由于结构人类学派能够抓住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整体性核心——结构，能够掌握方法论的过程——模式化，因而往往略胜一筹于其他学派。^①

——象征人类学学派的大师维克托·特纳（Victor Witter Turner 1910~1983）从事人类学研究后，于50年代初在赞比亚的恩第布部落作了近30个月的田野调查。60年代他从英国

^① 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5页。

转到美国大学任人类学教授时，又曾经远赴非洲、欧洲、中美洲、印度及日本等地进行广泛的田野调查。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特纳创立了“象征人类学”学派，他的论著也被“公认为最近几十年来人类学界所出现的最佳论著之一”。^①

国际人类学界的大师们靠田野调查起家，中国人类学界的前辈们也是靠田野调查起家的。如：

——岑家梧（1911~1966），生前为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曾先后到云南、四川、贵州、广东等地进行田野调查，从事艺术史、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史前史等课题的研究，在学术界影响广泛。他著有《史前概论》、《史前艺术史》、《图腾艺术史》、《西南民族文化论丛》、《中国原始社会史稿》等。

——费孝通（1910~），现为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一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而从未放松过田野调查。他根据田野调查而写成的《江村经济》是人类学本土化的开山之作。其他如《禄村农田》、《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著作，以及近十几年来对小城镇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在人类学界都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

——江应樑（1909~1988），生前为云南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南方民族研究，特别是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对云南的傣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作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著有《傣族史》等。

——梁钊韬（1916~1987），生前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一向重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著有《中国民族学概论》（合著）、《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等。

^① Henry G. Barnard, Victor Turner: A Bibliography (1951-1975). *Anthropologica*. n. s. 17 (1-1) (1985). p. 107. 转引自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64页。

——李安宅 (1900~1985), 1934年至1936年在美国留学时曾对美国印第安祖尼母系社会进行了田野调查, 发表了《祖尼: 母系社会研究》, 对美国人类学家史蒂文森 (M·C·Stevenson) 和邦泽尔 (R·L·Bunzel) 等人对祖尼人研究的看法提出了质疑, 对人类学方法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回国后曾对藏族的宗教进行了田野调查, 出版了《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 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

——李方桂 (1901~1987), 对中国壮侗语族的许多语言和方言进行了开创性的田野调查, 其中也涉及民族文化的其他方面, 著有《比较台语手册》、《龙州土语》、《莫话记略》等, 成为中国非汉语言研究的开创人和奠基者。

——李景汉 (1894~1986), 生前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长期从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教学。他主持的定县社区调查, 对中国北方农村社区的研究有重要影响。此外, 他还对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社区进行过田野调查, 著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等。

——林惠祥 (1901~1958), 生前为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 毕生致力于人类学的研究和教学, 对东南亚及我国的少数民族进行多次田野调查, 是中国对台湾省高山族最早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 著有《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苏门答腊民族志》、《婆罗洲民族志》、《中国民族史》等。

——林耀华 (1910~),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曾深入福建汉族聚居的乡村, 以及彝族、藏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 著有《金翼》、《凉山彝家》等。

——凌纯声 (1901~1981), 毕生致力于人类学研究, 并深入各民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 其关于东北的赫哲族和湘西苗族的田野工作及著作被誉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佳作。他的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

告》、《畚民图腾文化的研究》等。

——潘光旦（1899～1967），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他在50年代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以史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土家族的民族认定起了重要作用。他著有《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等。

——许烺光（1909～1996），1977～1978年曾任美国人类学协会主席，长期在中国的中部、北部和西部、南部及美国夏威夷华裔居住区、印度、日本等地进行田野调查，首先提出“心理人类学”的概念。他著有《中国南部家庭的功能》、《祖荫下：中国亲属关系、个性和社会流动性》、《美国人和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比较》等。

——杨成志（1901～1991），生前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他多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著有《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广东北江瑶人调查报告》、《海南岛苗黎调查》等。

凡此等等，不胜枚举。一句话，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纵观国际人类学的发展史，各学说、学派的出现，无一不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和升华出来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讨论人类学本土化问题，不能不特别慎重地提出，对中国社会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是中国人类学界的重大使命之一。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一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心理的关系和规律的学科，必须以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为己任。所以，人类学从本质上说是属于人民的。当前，面临世纪之交，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人类所面临的许许多多问题，中国所面临的许许多多问题，都需要人类学家们作出解释和分析，给出答案和对策。因此，说到底，人类学本土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而要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人类学必须走向人民、走向社会，而不应该